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 张国良 主编

黑龙江卷

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中国发展传播学

■ 王 迪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重大项目成果

张国良 主编

中国发展传播学·黑龙江卷

王 迪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发展传播学·黑龙江卷 / 张国良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308-05060-9

I. 中… II. 张… III. 传播学—研究—黑龙江省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718 号

总 序

张国良

大约 6 年前,也就是 2002 年下半年,由我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CHINES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S,简称 CDC)正式启动。其研究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开展一项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旨在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经过反复讨论、细致规划,我们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研究团队,于 2002 年底、2003 年初,分头奔赴全国八个省份,实施了入户调查,同时,还对当地主要报纸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领导访谈。在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后,各团队成员又投入了紧张的统计分析和报告撰写中,经过 3~4 个寒暑的辛劳,陆续完稿,最终交出这样一份总篇幅逾 200 万字的答卷。

回首往事,颇为感慨!这一项目的背景如下:

世纪之交,为了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在全国高校设立了一百多个“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严格评审,由我担任主任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被批准为全国传播学科中唯一的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职责,是持续地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于是,本人申报的“中国发展传播学”被确立为首批重大课题之一。

既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发展自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因此,诸如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伦理学等,无不构成学科关注的热点。但遗憾的是,由于传播学在中国起步很晚,大致与改革开放同步,基础很弱,短短 30 年里,又历经各种曲折,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才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以传播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传播学,也就一直处于缺失、贫弱的状态之中。

我之所以构想、申报上述项目,初衷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在我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不对本土的发展问题予以足够注意,那无疑是失职。而这一项目当年很快就顺利通过了教育部及专家的审核,则又表明,对发展传播学的重视,业已成为共识。

从时间角度看,2002 年恰好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和实质意义的节点。它是改革开放的第 25 个年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一方面,2001 年底加入 WTO(即“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使中国真正融入了

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2002年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均约8000元,接近1000美元(2003年实现了超越),也就是说,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跨入了小康阶段,并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不仅如此,2002年又处于新媒体大发展的前夜。该年,中国广告业的产值近1000亿元,而整个媒体产业的总产值近2500亿元,总体呈现出蓬勃生长、方兴未艾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新兴媒体已悄然崛起,开始形成对传统媒体的强力冲击,以最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为例,2002年其用户已超过4500万人,跃居世界第二。

综上所述,在此历史关节点上展开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概而言之:

第一,作为历史实录的文献,它通过定量方法,以数据和事实文本的方式,忠实地描述、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中国传播产业与社会发展的互动状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史料性。

第二,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它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资料,并且给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结论,据此,既可纵向比较,又可横向对照;既可深化认识,又可凝练理论。

第三,作为工作改进的依据,它发现了媒介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和不足,诸如:媒介设施的城乡差距显著、重要议题的深度认知率低下、揭露坏人坏事不够有力、反映群众呼声不够充分、品位格调不高等等,其中的绝大部分意见,至今仍不失参考作用。而且,尤需注意的是,除了全国层面上的一些共同症结外,各地的问题其实又不尽相同,为此,本项目的最终成果,以一个总报告和八个分报告的形式,加以全面、具体地呈现。

由于这是一项面向全国的大规模、综合性、实证性的研究,工作量堪称浩大。就问卷调查而言,覆盖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约4.5亿人口),从最北部的黑龙江省、甘肃省,到最南部的云南省、广东省,从大都市、中小城镇到乡村,纵横以千万里程计,跋涉于山水阡陌间,访问样本家庭近3000户、人数逾万。就内容分析而言,选取各地32种报纸(为期两周),合计400多份,统计、分析了约25000条新闻信息。如此繁重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若非得到了各地兄弟院系师生的鼎力支持(动员人力500人次以上),其完工根本难以想象。

在此,作为这一重大课题的总负责人、系列丛书的主编,本人谨向全体为CDC项目做出各种贡献的人士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当中包括:李双龙、廖圣清、韩纲、李兆丰、朱春阳、郑征予、严三九等。

对于以下直接参与书稿写作的人员,致以特别的敬意!他们是:徐晖

明(总报告、广东卷)、王迪(黑龙江卷)、郑西帆(浙江卷)、王玲宁(河南卷)、郑智斌(江西卷)、禹卫华(四川卷)、郭建斌、曹云雯(云南卷)、姚君喜(甘肃卷)。

最后,衷心地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研究项目和本系列丛书的“慧眼识珠”,尤其是责任编辑徐婵女士的睿智、耐心和宽容,使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终于圆满完成了! 尽管其必然还存在各种缺陷,期待广大读者的指正,但无论如何,作为撰写“中国发展传播学”历史长卷中的一页的尝试,我们尽力了,也问心无愧了。

2008 岁末

于沪上文化花园明珠苑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发展与“信息鸿沟”的消除	1
第一节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	1
第二节 发展传播学研究综述	2
第二章 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7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回顾	7
第二节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8
第三章 黑龙江省社会和大众媒介发展状况	11
第一节 社会发展状况	11
第二节 媒介发展状况	17
第四章 受众抽样调查概况	20
第一节 抽样调查概况	20
第二节 样本的人口状况	22
第三节 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的总体情况和闲暇时间	32
第五章 报纸的接触和评价状况	45
第一节 读报的情况	45
第二节 报纸的接触内容和频率	51
第三节 报纸的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	52
第四节 对报纸的总体评价	56
第六章 电视的接触和评价状况	61
第一节 看电视的情况	61
第二节 电视的接触内容和频率	65
第三节 电视的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	67

第四节 对电视的总体评价	70
第七章 广播的接触和评价状况	75
第一节 听广播的情况	75
第二节 广播的接触内容和频率	81
第三节 广播的需求动机和满足程度	82
第四节 对广播的总体评价	85
第八章 网络的接触和评价状况	90
第一节 上网的情况	90
第二节 网络使用目的和影响	95
第九章 其他媒介的接触状况	98
第一节 杂志的接触状况	98
第二节 书籍的接触状况	104
第三节 录像(包括 VCD/DVD)的接触状况	107
第四节 电影的接触状况	111
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效果	114
第一节 黑龙江省媒介和大众关系概况	114
第二节 社会议程测量	119
第三节 议题认知程度测量	134
第十一章 黑龙江居民的人际交往与现代化观念测量	155
第一节 黑龙江居民的人际交往状况	155
第二节 黑龙江居民的决策行为状况	161
第三节 黑龙江居民的社会交往观念	165
第四节 黑龙江居民现代化观念考察	172
第十二章 传播效果与人口因素相关分析	177
第一节 教育程度与媒介行为	179
第二节 居住地与媒介行为	186
第三节 性别与媒介行为	196

第十三章 媒介内容分析——以报纸为例	203
第一节 报纸抽样概况	203
第二节 内容分析说明	204
第三节 内容分析描述	204
第十四章 结语	224
第一节 大众媒介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	226
第二节 黑龙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媒介	233
第三节 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促进作用的思考	234
总编访谈	240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1

第一章

社会发展与“信息鸿沟”的消除

第一节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实现是任何民族在当代世界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现代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人的观念的现代化是最缓慢而艰难的,它涉及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最核心的因素,涉及到人的生存方式。而在当代社会,媒介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也是文化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媒介机构和媒介文化的根本责任是推动社会进步,大众传媒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拉斯韦尔曾提出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学说,张国良教授主编的《新闻媒介与社会》一书中总结为,大众传媒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如下功能,它们是“协调社会功能”、“监测环境功能”、“传承文化功能”。具体而言,大众传媒为预警性信息的传递、服务性信息的沟通,为文化的代代相传,为新技术、新科技的扩散,为人们观念的更新、态度的转变,为社会规范的实行,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正因为有了大众传媒这个“现代化的推进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才能均衡而有效率地进行。

因特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式,进一步推动了新技术、新知识的普及,使传播媒介获得了新的机会和方式。但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知识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新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的威胁,即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中国面临的“数字鸿沟”,出现于中国与世界之间、中国各地区之间、中国城乡之间。在信息时代,一方面,信息需求和人的食物、饮用水一样成为

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知识和信息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消除“信息鸿沟”、发挥大众媒介对国家发展的应有作用,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如何消除中国与世界、中国不同地区、中国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第二节 发展传播学研究综述

发展传播学研究大众媒介和国家发展、社会发展之间关系,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这一理论从诞生伊始就受到了全球关注。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当中,发展传播学逐渐发展、变革、充实,对全球现实的传播政策、传播理念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我们不能否认,时至今日,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一、国家发展的概念及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的殖民体系逐渐崩溃,在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了一大批独立的国家。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取得独立以后,面临着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独立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课题。为了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新的关系、重新树立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政府推广以马歇尔计划为基础的一系列协议来构建起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意图通过援助发展中国家来达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由此带动起一批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转向亚非拉的社会研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各自的著名学府里建立了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的某些机构也相应资助了一些促进第三世界发展的项目。

国家发展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核,并且随着各国经济实践的发展不断继承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发展理论包含了两个理论假说,即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其他非经济领域的“枢纽”。但是,这一理论因为现实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失衡而被质疑乃至抨击。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两支理论学派代替了旧有的理论:一是在“旧典范”基础之上发展的“新典范”,即从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果中找出发展的矛盾;另一是“帝国主义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抨击了旧经典理论。同一时期,在拉丁美洲则出现了“依附理论”,研究帝国主义中心

扩张在不发达国家中造成的后果,成为“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对 70 年代出现的东亚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等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受依附理论和法国阿诺尔学派的影响,又出现了“世界体系理论”,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体系,从全部历史和其具体的现实中加以考察,探讨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

各个学派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发展的理论可以被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发展理论仍然在“发展”当中。

二、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播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传播的威力也愈来愈被认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的手段和方法也日新月异,发达国家欲利用新兴媒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技术及文化,发展中国家也意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帮助自身摆脱贫困,于是,发展传播学这一传播学的新兴分支愈来愈受到重视。发展传播学致力于研究发展传播和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揭示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和国家发展研究的脉络总体上保持一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理论著作和代表学者。

发展传播学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发展怎样构成;依靠什么策略可以完成发展;传播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等等。这一研究滥觞于 1958 年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在这本书里,勒纳提出了理论框架,认为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系统,一是传统社会,另一是现代社会,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论述了传播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发展传播学和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这本书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行动,启发了研究者开始思考传播在社会转变中的角色和作用,它的出版标志着发展传播学的诞生。

发展传播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展传播学的初创阶段,属于进化论范式。代表作有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白鲁恂的《传播与政治发展》和施拉姆的《传播媒介和国家发展》。他们认为,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需要调适自身的行为和态度,这种调适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这种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状作为传统社会发展的最终模式,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自我

中心意识;同时受到了传播学发展中的“强效果理论”的影响,强调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

第二阶段是发展传播学的修正阶段,代表著作是罗杰斯的《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这一时期的研究注意到以西方模式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巨大缺陷,但未能摆脱旧典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发展传播理论,既是发展实践挫折的间接反映,也受到了大众传播“弱效果”理论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研究,立足于从全球的整体发展来考察国家发展的因素,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从全球的经济和资讯结构的角度来探讨国家发展问题。

三、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经典

在发展传播学的不同研究阶段中,涌现了发展传播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和大师。

1. 旧典范时期

(1) 勒纳的“移情”模式。

1950—1951年,勒纳对中东地区六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之后,勒纳第一次提出了传播和国家发展的有关概念,认为发展是一种运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必须重复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的传播形式和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趋势是从传统社会的口头传播到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勒纳对社会系统和传播系统的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规定了四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普及和政治参与。勒纳把人的现代化提高到了与社会经济形态现代化同样突出的地位,提出了著名的“移情”概念。“移情”是一种性格或者能力,从心理学角度讲,具有这样性格的人容易适应并赞助变革,接受自己前所未有的地位和角色。综述之,即,动态的心理和个体是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关键性因素;勒纳把转变人的想象力的角色归于传媒,将大众媒介比喻为“奇妙的放大器”。勒纳的理论模式以西方为蓝本,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条件,对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有简单化和过分乐观化的倾向,忽视了社会形态及结构等因素对大众传媒的制约作用。

(2) 施拉姆的传播发展战略。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联合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行动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大众媒介系统,帮助其进行现代化。施拉姆根据这些材料,在1964年出版了《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进一步发挥了勒纳关于传播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学说,从宏观角度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应加大对传媒作用的重视,促进现代化;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媒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意见;在对以往研究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传播和发展的各项现实问题;同时,把发展传播学推进更加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施拉姆提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过程,可以减轻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没有有效的传播,现代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教育和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从传播的三大基本功能出发,施拉姆认为传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施拉姆还具体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传播事业方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施拉姆很早就注意到全球信息流通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这种不平等现象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3)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

罗杰斯在 1962 年首版的《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一书里,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把发展传播研究引入了定量化,使其更加有操作性和应用性。罗杰斯将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普及和推广看作是特殊的传播形式,他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和接触型变化,第三世界的变化大都是接触型的,因此,社会变革的过程也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创新发明在社会的扩散传播过程中,包含了四个因素:新事物和新思想、传播渠道、时间、接受创新发明的社会成员。同一创新在不同社会中被采用的速度快慢,取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作用,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更有利于创新扩散,反过来,创新扩散也会起到改变社会制度的作用。

2. 旧典范的批判和修正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被发现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出现了批判和修正两种观点。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修正观点认为,第一代典范把不发展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而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复合作用。因此,在考察传播与国家发展时,应注意:信息传播、社会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平等;大众参与;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和独立;传统体制和现代体制的结合。但是,新典范并没有放弃 20 世纪 60 年代的根本观念,只是从统一模式转变为因地制宜的“国家媒介政策”。与此相对的,是批判学派的研究者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从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出发,对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

3. 新模式的兴起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发展传播学进入了新的理论典范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者进一步肯定大众传播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多元的立场对待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认为各发展中国家应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目标和道路,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发展传播模式。同时,受批判学派的影响,发展传播学开始重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传播的影响,认为传播是整个社会发展系统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事业的发展应以整体的发展策略为前提。

发展传播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 40 多年历史,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展示了大众媒介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不足之处,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复杂性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作用和效果的多样性。

第二章

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中国跨世纪战略发展的关键之地与关键一役》的课题报告中提出：“国民经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集中于东北，对国民经济威胁最大的矛盾集中于东北，但中国发展与改革新的期望也在于东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今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目前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较大的困境，东北地区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而且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速度。

第一节 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回顾

东北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最早、发展也最为完善的地区。建国以后，国家于“一五”、“二五”期间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从而形成了今天东北三省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

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主要以钢铁业、汽车制造业、船舶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军用设备制造业等为主。东北地区凭着其丰富的天然资源、良好的计划执行优势，在改革开放前对中国经济有巨大的贡献。1978 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均 GDP 分别名列全国的第一、第四和第二位，其中辽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4 年之前一直名列第一。直到改革初期，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外，在全国（除台湾外），东北三省名列前三。到 1995 年，人均 GDP 辽宁名列全国第 4 位，黑龙江为第 8 位，吉林为第 11 位。

1993 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迅速开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在 80 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90 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发展。

当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已大踏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东北还停滞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下缓慢进行,东北的经济也在双重体制的摩擦下艰难地生存和增长。

在1981—2001年间,东北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有7.6%(按当年价计算),而沿海新兴工业区为14.8%。东北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1980年为18.7%,1985年为17.8%,1997年下降到9.1%,2001年又下降到8.0%;而沿海新兴工业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则由1980年的25.4%提高到2001年的50.4%,东北经济的发展进入了“衰退期”,也就是学者所说的“新东北现象”。

东北地区前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结构性矛盾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老的支柱产业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减弱,新的支柱产业又没有及时形成;产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少,中低档大路货多,缺乏竞争力,前景堪忧。昔日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何时能重新焕发生机?

第二节 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面积接近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1千万,占全国人口的8%。2002年,整个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603亿元人民币,平均增长率为9.2%,较广东或其他沿海地区明显逊色。东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1%,仅相当于广东省当年的比例。

一、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2002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5.3%,而东北三省均低于这个平均值,辽宁为13.7%,吉林为14.6%,黑龙江为13.4%,其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名列全国的第20位、第16位和第22位。2002年,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40亿美元,是全国的8%,远低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2002年,东北三省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587亿人民币,占全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但东北地区的总消费额比广东省一年消费额还少,东北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与沿海发达城市的消费水平仍有一段距离。究其原因,不外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东北地区人均收入低迷导致